

唐武德二年罽宾国贡品考*

——兼论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原为大明宫琼林库皇家宝藏

林梅村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

关键词: 罽宾国, 贡品, 何家村窖藏, 中亚玻璃碗, 大明宫, 琼林库

摘要: 唐武德二年(619年), 中亚罽宾国来朝, 进贡宝带、金锁、玻璃碗、水晶杯, 以及名为“颇黎”的490枚宝石。我们最近发现, 唐初罽宾国五种贡品皆见于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 如骨咄玉带、鎏金银锁、凸环纹玻璃碗、八曲水晶长杯, 以及红宝石、蓝宝石等。经化学成分检测, 这件玻璃碗实乃中亚植物灰玻璃器, 而非目前普遍认为的萨珊玻璃器。这个发现还说明, 何家村唐代窖藏原为大明宫琼林库皇家宝藏。唐建中四年(783年)爆发“泾原之变”, 唐德宗被迫离开长安到奉天避难。皇上无法将大明宫琼林库宝物全部带走, 不得不将部分金银财宝临时埋藏在长安城兴化坊某地(今西安南郊何家村)。这批仓促埋下的皇家宝藏后来被人遗忘, 故一直保留至今。

KEY WORDS: Tributes from Kapisa, the Tang Period treasure of Hejiacun, Central Asian glassware, Royal storehouse of *Qionglinku*

ABSTRACT: In 619 AD, the Kapiša kingdom in Central Asia sent diplomats to Chang'an, the capital city of Tang Dynasty, bringing tributes including jade belts, gold cangues, one glass bowl, one crystal cup and 490 pieces of gemstones. According to our recent research, the five kinds of tributes mentioned in historic records are confirmed by a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a treasure hoard at the Hejiacun village in the south suburbs of Xi'an in 1970. This excavation yields many findings, including the jade belts of Khuttal, gilding sliver cangues, a glass bowl with relief decorations, an octagonal crystal cup and 16 pieces of gemstones. Through scientific analysis, the glass bowl from this treasure hoard should be made of plant-ash glass, indicating that this piece should not be Sasanian glassware as considered by many scholars previously. This research further argues that the Tang period treasure hoard of Hejiacun might have been the royal treasures from the *Qionglinku* storehouse near the Daming Palace of Chang'an. In 783 AD, because of the Jingyuan garrison rebellion, Emperor Dezong of Tang had to flee to Fengtian from Chang'an. The whole treasures stored in the *Qionglinku* storehouse could not be transported with the emperor and a part of them had to be buried near the Xinghua grid of Chang'an. These royal treasures of Tang China had been forgotten until the recent excavation.

唐王朝建立不久, 四海称臣, 万国来朝。唐武德二年(619年), 罽宾国来朝, 进贡宝带、金锁、玻璃碗、水晶杯, 以及名为“颇黎”的宝物490枚^[1]。《汉书·西域传》记载: “罽宾国, 王治循鲜城(今巴基斯坦塔克西拉), 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 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今新疆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六千八百四十里, 东至乌秴国

(今巴基斯坦洪扎山谷)二千二百五十里, 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 西北与大月氏(今阿富汗西北)、西南与乌弋山离(今阿富汗西境)接。”^[2]故知罽宾国以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中下游为中心, 南至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 也即古代迦毕试、犍陀罗、咀叉始罗等地^[3]。汉唐时代, 西域诸国往往把都城之名当作国名。罽宾国的首都原来在迦毕试(今阿富汗贝格拉姆), 故称

*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文物古迹调查》的资助, 项目批准号15JJD780001。

“罽宾国”。后来迁到循鲜城，仍沿用罽宾之称。古希腊人称喀布尔河为 $K\bar{o}ph\bar{e}n$ (= 拉丁语 $Cophen$)，罽宾之名或源于此^[4]。这个古希腊地名的宾格形式写作 $K\bar{o}ph\bar{e}s$ (= 拉丁语 $Cophes$)，故《大唐西域记》称作“迦毕试国”^[5]，而唐宋正史或称之为“劫国”^[6]。

关于唐高祖武德二年罽宾国朝贡之事，我们查到三条史料：第一，《新唐书·西域传》记载：“罽宾，隋时漕国也，居葱岭南……武德二年，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盃、颇黎状若酸枣。”^[7]第二，《太平寰宇记》记载：“劫国……婚姻同突厥，土俗与嚧哒同……唐武德二年，遣使贡宝带、金锁甲、玻璃水精杯各一；玻璃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枣，小者如酸枣。”^[8]第三，《文献通考》记载：“劫国，隋时闻焉，在葱岭中。西与南俱与罽弥国界接，西北至挹怛国（嚧哒的别称），去长安万二千里。有户数万。气候热，有稻、麦、粟、豆、羊、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弃于山。唐武德二年，遣使贡宝带、金锁、玻璃水精盃各一，玻璃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枣，小者如酸枣。”^[9]

我们最近发现，唐初罽宾国觐献的五种贡品（宝带、金锁、玻璃碗、水晶杯，以及形状如酸枣的“颇黎”宝物），皆见于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10]。2017年4月，我们赴西安实地考察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与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联合检测了相关文物的化学成分，收获巨大。草拟此文，介绍这次西安考察的初步成果。若有不当之处，还望海内外研究者不吝赐教。

第一，宝带（骨咄玉一具）：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共发现10副蹀躞玉带，以前认为皆属唐代之物。不过，近年有学者考证，只有银盒墨书提到的9副蹀躞玉带是唐代之物，无墨书记录的九环金玉蹀躞带，以前在北周古墓中发现过，实乃传世品^[11]。这10副蹀躞玉带中有9副分别置于4个银盒里，盒盖内有墨书记录这些蹀躞带的玉色、名称、形制和组成数量。

其中一个银盒装有三条玉质蹀躞带。盒盖内墨书读作：“光明碎红砂（旁注：四两）一六斤。白玉纯方胯，十五事失袂；骨咄玉一具，深斑玉一具，各一十五事并袂”（图一）^[12]。所谓“光明碎红砂”，即丹砂，又名朱砂、汞砂，是古代炼丹的主要药品^[13]。

玉石工艺本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传统工艺，不过，公元5~6世纪中亚粟特工匠也掌握了这门手艺。2013年，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在扬州召开扬州曹庄隋唐墓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10余位专家一致确认扬州曹庄隋唐墓葬为隋炀帝墓。我们感兴趣的是，隋炀帝墓随葬了一套十三环金玉蹀躞带^[14]。《隋书·何稠传》记载：

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妥入长安。仕周御饰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大业初，炀帝将幸扬州，谓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业，服章文物，阙略犹多。卿可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送至江都（今扬州）也。”稠于是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鹵簿、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今扬州）。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15]

由此可知，何稠不仅为隋朝皇室制作御衣，而且他父亲何通还是粟特玉器工艺大师，那么，隋炀帝墓所出十三环金玉蹀躞带很可能是何稠为隋炀帝监造的。

据研究者考证，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了骨



图一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银盒“骨咄玉一具”墨书题记



图二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中亚骨咄国白玉蹀躞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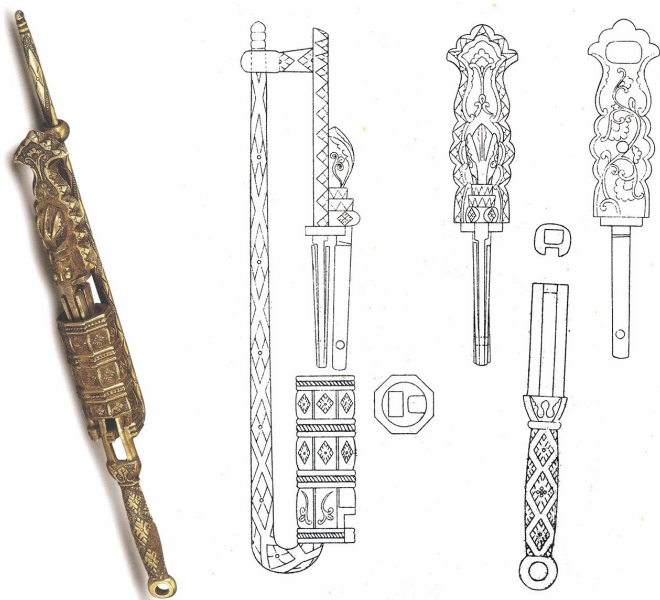
咄玉蹀躞带一副 16 件，玉质青绿，杂有黑色和淡黄色斑点。其中包括 4 件长 3.7、宽 3.5 厘米的方形玉带板，9 件长 3.6、宽 2.6 厘米的半椭圆形玉带板，以及圭形玉带板、铊尾和带扣各一件，总计 16 件，总重 246.8 克（图二）^[16]。骨咄国乃西突厥一支，又称“珂咄”，《大唐西域记》作“珂咄罗”^[17]。《新唐书·西域传》记载：“骨咄，或曰珂咄罗，广长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马、赤豹，有四大盐山，山出乌盐。”^[18] 这个帕米尔西部小国，地处阿姆河上游喷赤河流域山谷，在今塔吉克斯坦首府杜尚别东南 125 公里处库利亚布^[19]。何家村窖藏银罐墨书提到“骨咄玉一具”，说明骨咄国工匠也掌握了玉石加工手艺，那么，唐初罽宾国贡奉的宝带或许就是这条中亚骨咄国白蹀躞带。

第二，金锁（鎏金银锁）：唐初罽宾国第二件贡品是“金锁”，亦见于 1970 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实乃鎏金银锁（图三）^[20]。何家村唐代窖藏共发现 17 件菱格纹鎏金银锁和 6 件银锁。这些银锁分锁体和钥匙两部分，采用弹簧结构；做工考究，工艺相同，纹样相似，通体饰菱格纹；长度约在 10~19 厘米之间，至今尚能使用，开锁自如^[21]。一般认为，“锁具的发源地有两个中心：一是两河流域及埃及，以

后传到希腊、罗马以及整个西欧，直到英伦三岛，再到美国；一是中国，以后传到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地。中国起初用木锁，汉代出现铜质簧片结构锁，俗称三簧锁或簧片锁，利用两三片板状铜片的弹力来达到封关和开启作用。由于簧片装置能作多种变化，并可用钥匙孔形来决定钥匙的式样，安全性能、保密性较木质锁前进了一大步，使用范围也更加广泛^[22]。公元前 2 世纪，中国三簧锁开始沿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23]。唐初罽宾国贡奉的鎏金银锁就属于中国三簧锁体系，只是用金银材料制作。

2006 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汉市武昌区梅家山发掘了一座方形砖室墓，随葬遗物相当丰富，包括精美的白釉瓷器、八棱体漆木葬具、木法器等等。由塔铭可知，墓主为五代杨吴国高僧超惠大师。我们感兴趣的是，超惠大师墓出土了一把铜锁，与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鎏金银锁大同小异。锁体通长 12.4 厘米，由铜锁和门环组成。锁套和锁芯均呈竹节状，锁杆为圆柱体，一端细，一端粗，粗端弯曲连接锁芯。锁杆上套有双环卡子，为我们了解铜锁在五代时期的发展提供了另一实物标本^[24]。

第三，玻璃碗（琉璃碗）：《新唐书·西域传上》称作“水精盏”，《太平寰宇记》称



图三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鎏金银锁

之为“玻璃杯”，《文献通考》称作“玻璃盃”。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了一件三足提梁银罐。器盖墨书注明罐内贮物名称、件数等，读作：“玉盃一、玛瑙杯二、琉璃盃碗各一，珊瑚三段，颇黎等一六段，玉臂环四”。何家村唐代窖藏只发现一件玻璃器，置于三足提梁银罐内，当即器盖墨书所言“琉璃碗”。此碗呈淡黄色，透明度较好。直筒形、深腹平底，外壁饰凸环纹。口径 14.1、高 9.8 厘米；平底侈口，口沿外翻成圆唇，口沿下有一凸弦纹，腹部纵向排列 8 组，每组 3 个凸环纹（图四，右）^[25]。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件异国情调的凸环纹玻璃碗是从伊朗高原输入的萨珊玻璃器^[26]。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古玻璃专家罗伯特·布里尔（Robert Brill）赴伦敦调查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 Stein）在新疆各地采集的古代玻璃残片，大英博物馆实验室科技考古专家米歇尔森（Carol Michaelson）和弗里斯通（Ian Freestone）负责接待，并向他提供了斯坦因收集品中 13 件古代玻璃测试样本。2005 年，罗伯特·布里尔在上海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刊布了 13 件新疆出土古玻璃残片的化学成分及其相关研究，可惜他没有同时发表检测对象的照片，无法知道究竟是斯坦因考古报告中哪些古玻璃标本^[27]。

2017 年 3 月，我们专程赴伦敦调查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古玻璃残片。在大英博物馆中国部负责人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的陪同下，我们考察了该博物馆库房所藏斯坦因收集品，并取得意外收获。1907 年，斯坦因在新疆和田 Moji Tagujai 采集到一片淡黄色凸环纹玻璃残片（图四，左）^[28]。经我们核实，这个遗址在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木吉乡。令人振奋的是，罗伯特·布里尔 2005 年刊布的斯坦因采集的古玻璃残片测试标本中，居然有这个玻璃残片（编号 8505）。它的化学成分并非萨珊植物灰玻璃，而是中亚植物灰玻璃^[29]。那么，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凸环纹玻璃碗当为中亚植物灰



图四 新疆和田出土凸环纹玻璃器残片与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凸环纹玻璃碗

玻璃。2017 年 4 月，我们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检测这件凸环纹玻璃碗的化学成分，检测结果正是中亚植物灰玻璃^[30]。

目前国际学术界根据化学成分将东西方古代玻璃分为钠钙玻璃（碱石灰玻璃）、铅钡玻璃、钾钙玻璃三大类。由于助溶剂不同，钠钙玻璃又进一步分为草木灰（plant ash）、泡碱（natron）两类。草木灰玻璃的助熔剂常选用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始于青铜时代晚期埃及、两河流域、帕提亚王国、萨珊王朝和阿拉伯帝国。中亚玻璃亦为植物灰玻璃，但是氧化钾含量与萨珊—伊斯兰玻璃不同。罗马帝国时期（公元前 27 年～公元 476 年），地中海地区玻璃成分高度相似，泡碱（苏打）玻璃占据主导地位^[31]。古代中国也能烧造玻璃，但是工艺与西方钙钠玻璃不同，采用铅钡玻璃工艺^[32]。古代印度玻璃以硝石为助溶剂，属于钾钙玻璃（potash）系统。汉代以来，中国两广和交趾（今越南北方）亦流行钾钙玻璃，目前尚不清楚它们与古代印度玻璃之间的关系^[33]。

2007 年，美国学者丹尼尔·沃（Daniel C. Waugh）博士在华盛顿大学丝绸之路网站上刊布了 3 件古玻璃器照片，20 世纪 40 年代流散海外，现藏大英博物馆。其中一件为模制玻璃佛立像，丹尼尔·沃定为 8～9 世纪唐朝之物（图五，左）^[34]。在波斯文化的影响下，中亚很早就有模制人物肖像的工艺传统，如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城出土公元 1 世纪模制人物陶范（图五，右），现藏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35]。佛教在犍陀罗地区兴起后，中亚艺术家利用这门技术创作了大批佛像或观音像，



图五 大英博物馆藏模制玻璃佛立像与中亚撒马尔干出土公元1世纪模制人物陶范

而唐代中国工匠并不掌握这门技术。

佛教在罽宾一直流行到隋唐时代。《新唐书·西域上》记载：“罽宾，隋漕国也，居葱岭南。距京师万二千里而赢，南距舍卫三千里。王居脩鲜城，常役属大月氏。地暑湿，人乘象，俗治浮屠法。”^[36]公元8世纪，慧超法师在中亚游记中提到罽宾国信仰佛教。其文曰：“罽宾国冬天积雪，为此冷也。此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突厥，衣着言音食款，与吐火罗国大同小异。……国人大敬信三宝，足寺足僧。百姓家各并造寺，供养三宝”^[37]。因此，大英博物馆藏模制玻璃佛立像很可能出自罽宾工匠之手。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它将为研究中亚玻璃工艺提供另一实物标本。

第四，水晶杯（琉璃盃）：《新唐书·西域传上》称作“水精盃”，《太平寰宇记》称之为“水精杯”，《文献通考》称作“水精盃”，而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银罐墨书则称“琉璃盃”，皆指这个银罐所藏八曲水晶长杯，通长9.6、宽6、高2.5厘米；通体素面无纹，晶莹透亮，椭圆形，以弧形四面构成花形器身，底部是宽沿椭圆形圈足（图六）。

《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地平，温和，有苜蓿、杂草奇木、檀、槐、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

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酒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虏魄、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38]有学者将“璧流离”解释为“玻璃”，不一定正确。我们在《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一书指出，“璧流离”一词源于波斯语，相当于婆罗钵语 *belur/bylwl*（水晶）^[39]。“玻璃”一词在梵

文中是 *s'ilā*，在婆罗钵语中是 *jām*。为什么古汉语不直接用这两个词呢？看来，波斯胡商最初用玻璃冒充水晶与中国人进行交易。商人之奸诈，古亦有之^[40]。既然罽宾国盛产水晶，那么，何家村唐代窖藏所出八曲水晶长杯当为唐初罽宾国贡品。除了罽宾国之外，中亚撒马尔干城粟特使者也向唐朝贡献过水晶杯。《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开元初，贡锁子铠、水精杯、码碯瓶、驼鸟卵及越诺、朱儒、胡旋女子。”^[41]不过，罽宾国四种贡品皆见于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那么，这件水晶杯更可能是罽宾国贡品。

1970年，山西大同市南郊发现一座北魏建筑遗址，从中发掘出八曲银洗一件。这件八曲银洗高4.5、口径23.8×14.5厘米，纹饰朴素，形制独具特色，八曲每一曲都在器腹凹入较深，在口沿处又向器内侧深深盘曲，形成小弯，弯口处饰忍冬纹。洗心在椭圆形环内捶出二海兽。与其共同出土的还有高浮雕人物纹高足鎏金铜



图六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八曲水晶杯



图七 何家村唐代窖藏三足提梁银罐器盖内墨书

杯、镶嵌高足铜杯、线雕人物纹高足银杯（高足佚失）、锤雕缠枝葡萄纹高足鎏金铜杯各一件。有研究者将这件八曲银洗定为波斯萨珊之物，不一定正确。圣彼得堡埃米尔塔什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萨珊波斯的八曲银盘的造型和它很相似，但两者圈足、口沿和壁面纹饰均不同。故夏鼐认为这个窖藏中的“三件鎏金高足铜杯和一件部分鎏金银碗，也是输入的西亚或中亚的产品，带有强烈的希腊化的风格，但不是萨珊式的。”^[42]此外，这个八曲银洗上镌刻有大夏铭文，产地应在中亚地区^[43]。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唐初罽宾国贡品八曲水晶长杯的发现，再次说明八曲造型是中亚古代器物的艺术特征，那么，北魏平城出土八曲银洗更可能出自中亚工匠之手。

第五，颇黎状如酸枣（颇黎等一六段）：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银罐器盖墨书明确提到“颇黎等一六段”（图七），说明这个银罐内藏有16块“颇黎”。有学者将其误读为“颇黎等六段”^[44]，是不正确的。这个银罐内只有一件玻璃碗，器盖墨书称之为“琉璃碗”，可见窖藏主人将玻璃称作“琉璃”，那么，这个银罐内的16块“颇黎”想必不是玻璃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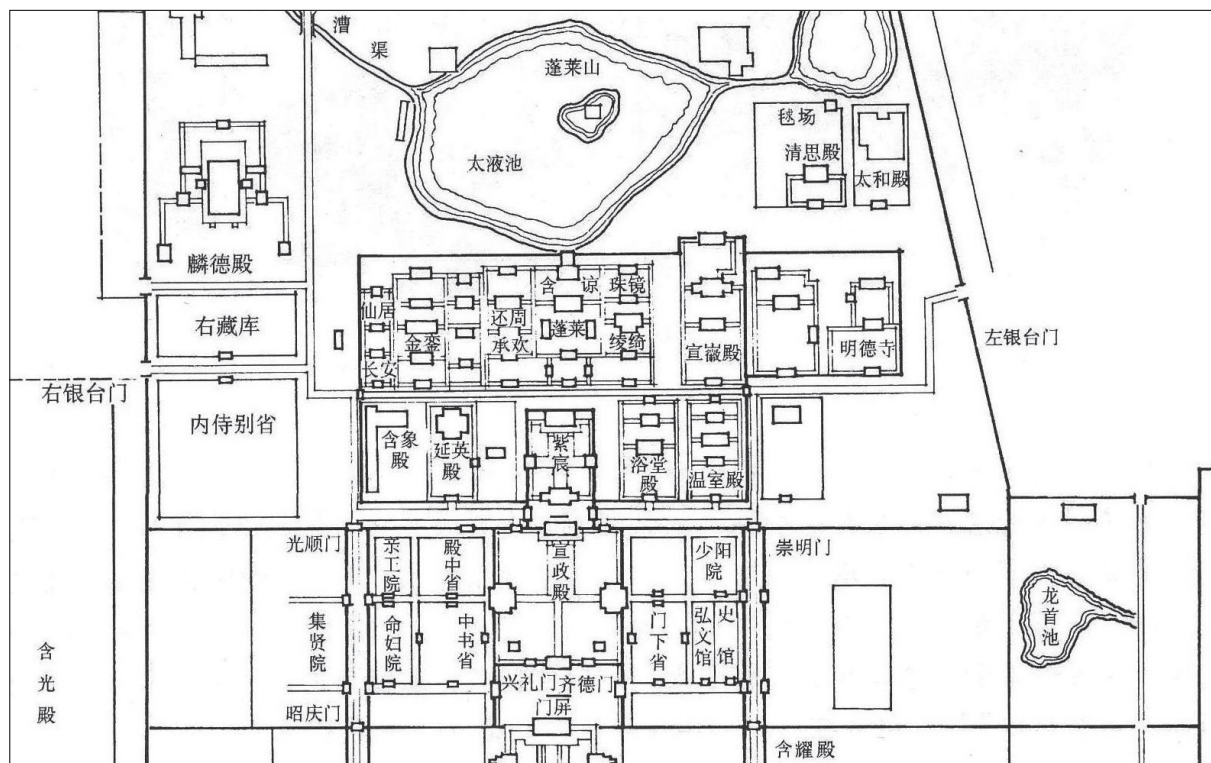
《新唐书·西域传上》记载：“武德二年，（罽宾国）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盏、颇黎（状若酸枣）。”^[45]故知何家村唐代窖藏所谓“颇黎”当为唐初罽宾国

贡品之一，形状如同酸枣一样。《太平寰宇记》记载：“劫国，唐武德二年遣使献玻璃水晶杯各一；玻璃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枣，小者如酸枣。”^[46]又知罽宾国所贡“颇黎”或称“玻璃”，大的像红枣，小的像酸枣，数量多达490枚。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一记载：“颇梨，千岁冰所化也。琉璃玛瑙，先以自然灰煮之令软，可以雕刻。”^[47]陈藏器《本草拾遗》云：“玻璃，能安心，明目，去赤眼，熨热肿。此西国之宝也。是水玉，或千岁冰化为之，应玉石之类，生土石中，未必是水。”^[48]总之，唐人认为玻璃属于天然宝石之类。在汉译佛经中，佛家七宝分别为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红珊瑚珠）、玛瑙。据我们考证，佛教七宝所谓“琉璃”指人造玻璃，而“玻璃”则指天然宝石^[49]。既然如此，那么，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银罐器盖墨书所言16块“颇黎”当指天然宝石。

据我们考证，古汉语“玻璃”一词有两个来源：其一源于波斯语“水晶”；其二源于梵语“蓝宝石”，两者本义皆非人造玻璃。在汉译佛经中，所谓“璧流离”亦作“毗琉璃、吠琉璃耶、鞞头黎”等，皆源于梵语 *vaid ū rya*（青色宝、蓝宝石），简称“琉璃”。慧琳《一切经音义》卷第十一曰：“吠琉璃：梵语宝名也，字体无定，或作琉璃。上音留，下音离；天生



图八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部分天然宝石



图九 傅熹年绘《大明宫平面图》

神宝，青绿色，莹澈光明。非是人间练石烟火之中所成琉璃也。”^[50]故知汉译佛经所谓“壁琉璃”，或简称“琉璃”，本指中亚罽宾国、斯里兰卡等地出产的蓝宝石，而“琉璃”一词在汉译佛经中往往用来表示人造玻璃^[51]。何家村唐代窖藏银盒墨书将天然宝石称作“颇黎”，似乎为了和该窖藏银盒墨书表示玻璃的词“琉璃”相区别。

据考古简报统计，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天然宝石共计4种16块。它们分别为蓝宝石7块，玫瑰紫2块，绿玛瑙6块，黄精1块（图八）^[52]。据韩建武分析，第一，绿玛瑙当称“绿玉髓”（chrysoprase），共6块，呈豆瓣状，似戒面大小，加工规整，底部有一平面，原来镶嵌在器物上。第二，黄精当为黄宝石，现代矿物学名“黄玉”（topaz）。只有1块，核桃大小，一面切割过，一头有穿孔；长5.3、宽3.3、高3.4厘米。透明，黄色，色较均匀，强玻璃光泽。其说有误，据我们检测，这块“黄宝石”当为黄色蓝宝石（sapphire）。蓝宝石有各种颜色，不一定是蓝色的，还有黄色、白色和粉色等。

第三，玫瑰紫当为红宝石（ruby）：共有2块，玫瑰色透明宝石，其一呈扁平不规则形状。第四，蓝宝石（sapphire）：红宝石和不同颜色的蓝宝石皆由刚玉演变而来。何家村唐代窖藏共有7块蓝宝石，包括深蓝宝石3块和浅蓝宝石4块。深蓝宝石最大的一块呈圆鼓状，直径3.1~2.9厘米；另一块呈水滴状，纯净透明，光泽极佳，长2.8、厚1.5厘米^[53]。凡此表明，这个三足提梁银罐墨书所言“颇黎一六段”必指银罐内蓝宝石等天然宝石无疑。

第六，何家村唐代窖藏当为大明宫琼林库皇家宝藏：发掘者根据考古钻探并结合相关文献初步判断，何家村位于唐代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处。据此，郭沫若提出这批窖藏文物“为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因安禄山之乱逃奔四川时邠王李守礼（章怀太子的次子，金城公主的生父）后人所窖藏”。他还提出这批窖藏文物是邠王府的财物，可能在“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而后来未能挖出，所以才一直保留到现代^[54]。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段鹏琦考证，何

家村金器银埋藏年代实际上在唐德宗时期，发现地点是否为“邠王府的部位”仍有待商榷^[55]。近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提出新说，认为何家村窖藏主人是唐代尚书租庸使刘震，而窖藏埋藏年代当为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也因兵乱保存到现代^[56]。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黄正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刘震不见于正史，仅见于唐代小说，未必是历史真实人物^[57]。

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唐初罽宾国贡品的发现相当重要，说明这个唐代高等级文物窖藏当为唐王朝皇家宝藏。其实，何家村唐代窖藏中许多文物皆为皇家宝藏，如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日本和同开珎、高昌吉利等外国钱币即为东西方诸国献给唐王朝的贡品。何家村唐代窖藏还发现许多丹药。为了长生不老，唐朝许多皇帝炼丹嗑药，吃死了许多皇帝。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九《唐诸帝多饵丹药》统计，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因服食过量丹药中毒致死^[58]。据考证，给皇帝进奉的财物则纳入内库即琼林、大盈二库，以供皇帝私人使用。进奉物品种类繁多，包括金银、钱帛、器服、珍玩、骏马等等，其中金银占很大的数量^[59]。如果这些宝物确为唐代皇家宝藏，那么，它们原来的收藏地点当在大明宫皇帝私库——琼林库。

关于大明宫琼林库，《新唐书·陆贽传》记载：“至是天下贡奉稍至，乃于行在夹庑署琼林、大盈二库，别藏贡物。”^[60]。《宋史·食货志下一》记载：“元祐元年，右司谏苏辙论河北保甲之害，因言：‘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61]1957年，冯先铭在西安唐代大明宫遗址太液池附近采集到邢窑“盈”字款碗残片^[62]。显然，这件邢窑白瓷片应为大盈库之物，发现地点或为大盈库遗址。王长启认为：“大盈库是皇宫内最大的储存金银财宝的库房”^[63]。尚民杰、程林泉认为，就目前所知，可以肯定大盈库与琼林库属皇家私库的性质，二者很可能

在某些时期是交叉存在的，即有时只有大盈库而没有琼林库，有时则只有琼林库而没有大盈库，有时则两库并存^[64]。

殊不知，大盈库只收纳钱帛、布丝和瓷器，而金银珠宝则藏于另一皇家私库——琼林库。关于琼林库的具体位置，《旧唐书》记载：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安禄山攻破渔关以后，唐玄宗从大明宫宣政殿御所向西逃跑。据唐人李德裕《次柳氏旧闻》一书记载：唐玄宗逃出大明宫的具体路线是：自延英门出，经延英殿进入禁苑。后来在杨国忠策划下，改由“左藏库而去”。故知延英殿和左藏库皆在宣政、紫宸殿之西，也即太液池与延英殿之间^[65]。从傅熹年所绘大明宫复原图看，很可能是延英殿之北，金銮殿之东的一组建筑（图九）^[66]。

唐德宗即位后，力图削藩，结果引发四镇之乱。于是，唐德宗调关中之兵往山东镇压，结果引发“泾原之变”。原为幽州节度使的朱泚，在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年）被其弟朱滔所逐，西走长安，朝廷将其安置为泾原节度使。泾原兵被征发时，朱泚已经致仕，且居于长安城。泾原兵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十月过长安，未得朝廷赏赐，出长安后又折回城中发动叛乱。于是唐德宗仓皇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叛军推举朱泚为首领，率军攻奉天，史称“泾原之变”^[67]。

大明宫皇帝私库所藏各国贡品及各道所献宝物，大多被唐德宗携往奉天，翌年入藏奉天行宫“琼林”、“大盈”二库。翰林大学士陆贽护送皇上避难奉天，起草《奉天请罢琼林、大盈注二库状》，抨击唐德宗大敌当前，却不顾百姓死活，仍在奉天行宫大建皇家私库，聚敛钱财^[68]。由于东西太多，唐德宗无法将宫内宝物全部带走，宫中太监不得不将部分宝物临时埋藏在长安城兴化坊某地（今西安南郊何家村）。这批仓促埋下的皇家宝藏后来未能挖出，故一直保留至今。

2017年5月14日于京城蓝旗营寓所

- [1] 关于汉代西域都护府的位置, 参见林梅村. 考古学视野下的西域都护府今址研究 [J]. 历史研究, 2013 (6): 43-58.
- [2] 班固. 汉书: 西域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3864.
- [3] 关于中国与罽宾之间的古代通道, 参见马雍. 巴基斯坦北部所见“大魏”使者的岩刻题记 [C]// 西域史地文物丛考.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129-137.
- [4] (古希腊) 阿里安. 亚历山大远征记 [M]. 李活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305. C. E. Bosworth, "Kabul," *Encyclopaedia of Islam*, Leiden, The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rill NV, 1999.
- [5] 季羨林等. 大唐西域记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37, 注 1.
- [6] 此图引自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 [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30-31.
- [7] 欧阳修. 新唐书: 西域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240-6241.
- [8] 乐史编, 王文楚等点校. 太平寰宇记 四夷十五·西戎七(第 186 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3573.
- [9] 马端临. 文献通考: 四裔考十六(第 339 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262-2263.
- [10] a. 陕西省博物馆等. 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 [J]. 文物, 1972 (1): 30-42. b. 陕西历史博物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 花舞大唐春: 何家村遗宝精粹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 [11] 刘思哲.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九环玉带制作时代考 [J]. 考古与文物, 2013 (4): 95-99.
- [12] 陕西省文物局. 周秦汉唐文明 [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4.
- [13] 朱红. 唐代的红雪 [J]. 寻根, 2005 (6): 54-56.
- [14] 龚菲. 文物局认定扬州曹庄隋炀帝墓为真 [N]. 东方早报, 2013-11-17.
- [15] 魏征. 隋书: 何稠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596.
- [16] 韩建武.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宝石玉器 [J]. 收藏家, 2001 (3): 12.
- [17] 同 [5]: 111.
- [18] 同 [7]: 6256.
- [19] 同 [5]: 111.
- [20] 鎏金银锁线图, 引自韩伟. 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89: 160, 图 304.
- [21] 陕西历史博物馆. 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70.
- [22] 李文石. 锁具史图说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63.
- [23] 卢嘉锡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史: 机械卷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143-146.
- [24]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武汉市武昌区梅家山五代超惠大师墓发掘简报 [J]. 江汉考古, 2016 (4): 36-43.
- [25] a. 安家瑶. 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 [J]. 考古学报, 1984 (4): 420. b. 陕西省博物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 [26] a. 赵永. 论魏晋至宋元时期佛教遗存中的玻璃器 [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4 (10): 57. b. 齐东方. 丝绸之路与金银玻璃 [C]// 国家文物局编. 丝绸之路.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4: 42.
- [27] 罗伯特·布里尔 (Robert Brill). 抛砖引玉——2005 年上海国际玻璃考古“丝绸之路古玻璃”专题研讨会开幕词 [C]// 马波译. 干福熹主编. 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30-47.
- [28] 此图右引自大英博物馆官网.
- [29] a. 同 [27]: 41. b. Robert H. Brill and Colleen P. Stapleton, *Chemical Analyses of Early Glasses*, Volume 3, New York: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2012, p. 167.
- [30] 卢轩, 刘瑞, 贺达炘, 刘翔. 何家村唐代窖藏宝石和玻璃检测报告 [J]. 考古与文物, 2017 (6): .
- [31] a. Robert. H. Brill, "Chemical Analysis of Early Glasses,"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New York: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1999. b. 成倩, 郭金龙, 王博, 崔剑锋. 丝绸之路且末古国墓地出土玻璃器成分特点研究 [J]. 玻璃与搪瓷, 第 40 卷 (2): 27.
- [32] a. 赵匡华. 试探中国传统玻璃的源流及炼丹术在其间的贡献 [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1 (2): 145-156. b. Robert H. Brill and John H. Mart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 Early Chinese Glass," In: *Proceeding of the Archeometry of Glass Session of the 1984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lass*, Beijing, New York: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1991.
- [33] (德国) 碧姬·博雷尔 (Brigitte Borell). 早期北部湾地区的汉代玻璃器皿 [C]// 刘焱鸿译. 海洋史研究 (第四辑). 2012: 27-44.
- [34] 大英博物馆藏 Glass, Plaque with moulded figure of the Buddha. T'ang period, 8th-9th c. CE. (OA 1938.5-24.285), 引自美国华盛顿大学丝绸之路网页. (<http://depts.washington.edu/silkroad/museums/bm/bmtang.html>).
- [35] 这张撒马尔干遗址出土公元 1 世纪模制人物陶范照片, 为伦敦大学学院 (UCL) 博士生黄珊女士提供, 谨致谢忱!
- [36] 同 [7]: 6240.
- [37] (日本) 桑山正进主编.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 [M]. 京都: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92: 22.
- [38] 同 [2]: 3864.
- [39] D. N. MacKenzie, *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8.
- [40] 林梅村.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94.
- [41] 同 [7]: 6244.
- [42] 夏鼐. 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 [J]. 考古, 1978 (2): 113.
- [43] 林梅村. 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 [J]. 文物, 1997 (9): 58-59.
- [44] 同 [16]: 10.
- [45] 同 [7]: 6240-6241.
- [46] 同 [8].
- [47] 段成式. 酉阳杂俎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06.

- [48] 陈藏器撰, 尚志钧辑校. 本草拾遗 [M]. 合肥: 皖南医学院科研科, 1983: 25.
- [49] 林梅村. 珠宝艺术与中外文化交流 [J]. 考古与文物, 2014 (1): 91.
- [50] 慧琳. 一切经音义 (第 11 卷) [C]//大正藏 (第 54 卷, 2128 部). 东京: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 1924: 371.
- [51] 同 [49].
- [52] 同 [10]a.
- [53] 同 [16]: 7-11.
- [54] 郭沫若. 出土文物二三事 [J]. 文物, 1972 (3): 2.
- [55] 段鹏琦. 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小议 [J]. 考古, 1980 (6): 536-543.
- [56] 齐东方. 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地点和年代 [J]. 考古与文物, 2003 (2): 70-74.
- [57] 黄正建. 何家村遗宝和刘震有关吗?——与齐东方先生商榷 [J]. 考古与文物, 2004 (4): 73-74.
- [58] 林梅村. 鎏石入华考 [J]. 考古与文物, 1999 (2): 45-56.
- [59] 卢兆荫. 从考古发现看唐代的金银进奉之风 [J]. 考古, 1989 (2): 173.
- [60] 欧阳修. 新唐书: 陆贽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4920.
- [61] 脱脱. 宋史: 食货志下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4373.
- [62] 冯先铭. 近十年陶瓷考古主要收获与展望 [J]. 中华文物学会, (台湾) 1991.
- [63] 王长启. 西安市出土“翰林”、“盈”字款邢窑白瓷罐 [J]. 文物, 2002 (4): 83.
- [64] 尚民杰, 程林泉. 唐大盈库与琼林库 [J]. 考古与文物, 2004 (6): 81-85.
- [65] 杨希义. 唐延英殿补考 [J]. 文博, 1987 (3): 49.
- [66] 傅熹年主编. 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 2 卷)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379.
- [67] 《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唐德宗建中四年十月条.
- [68] 同 [60].

(责任编辑 朱艳玲)

(上接 56 页)

西夏文译本《六韬·文韬·明传》作：“**覩翫形：‘翫覩翫，翫覩翫，翫覩翫，翫覩翫，翫覩翫。’**”贾常业《西夏文译本〈六韬〉解读》一文直译为“太公曰：‘善见不怠，时至不疑，非知时止，此三种者，道之滞止所。’”意译为“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14]可参。

附记：小文草就于 2013 年 3 月 1 日，随后向《考古与文物》杂志投稿。2017 年 12 月 6 日收到校稿通知。小文待刊期间，裘锡圭先生主编，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全 7 册由中华书局于 2014 年 6 月出版。“要”字改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 4 册第 120 页亦已指出，请查看。“若”字，《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 4 册第 186 页改释为“𠄎（慧）”。“迥”，《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 3 册第 196 页亦指出。“至”，《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策〉释文》（《文物》1975 年第 4 期）已指出，小文漏引，实为疏忽，亦可参看《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 3 册第 219 页注释 [二]。

- [1] 王念孙. 读书杂志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466.
- [2] 黎翔凤撰, 梁运华整理. 管子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762.
- [3]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 马王堆汉墓帛书 [壹]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44.
- [4] 陈松长编著, 郑曙斌, 喻燕姣协编. 马王堆简帛文字编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430.
- [5] 同 [4].
- [6] 同 [4]: 64.
- [7]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银雀山汉墓竹简 (贰)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140.
- [8] 朱右曾. 逸周书集训校释 [M]. 皇清经解续编, 卷九页 5-6.
- [9] 黄怀信. 逸周书校补注译 [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6: 411.
- [10] 黄怀信. 逸周书校补注译 (修订本)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 377.
- [11] 同 [7]: 175.
- [12] 王继光. 敦煌唐写本六韬残卷校释 [J]. 敦煌学辑刊, 1984 (2): 37.
- [13] 同 [12].
- [14] 贾常业. 西夏文译本六韬解读 [J]. 西夏研究, 2011 (2): 66-67.

(责任编辑 王 辉)